

## 人工智能与人文专题

# 语言文学作为国家精神主权

陈众议

**摘要：**根据西方信守的帕累托定律，只要某政策符合百分之二十公民的利益，那么该政策便被认为是有效和正当的，其余百分之八十可以忽略不计。这便是资本主义世界屡试不爽的“二八定律”。然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致力于奉行和发扬集体主义的优良传统，故此有关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或缺。由是，我国不仅不能学西方弱化文科，反而应该加强之。这正是本文的缘起，其目的在于就作为人文内核的语言文学如何是国家精神主权阐发一得之见。

**关键词：**语言文学；精神主权；二八定律

语言文学作为国家精神主权是 AI 时代必须确立的关键理念。关于主权，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物理意义的领土和国家机器等有形畛域。然而，人文之所以可以化成天下，是因为以语言文学为核心的精神主权乃每个国家无形的审美、价值和情感认同的恒久呈现。

说通用语言是一个国族的精神文化主权，基本没有争议。一如国旗和国歌，每个现代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语，规范地说是载入宪法的通用语言。我国也应为中文立法。当然，“汉语”约定俗成，但中文更具包容性，也更符合实际。首先，中文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且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创造。从现代语言学界关于“汉藏语系”的界定（就像“印欧语系”之于印度和西方），到各少数民族对中文的维护和影响，就足

以说明中文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第一精神文化标识。其次，在西汉之前，中华民族并没有“汉族”或“汉语”的概念，后者是为区别匈奴等域外民族应运而生的。而中文的第一次规范为小篆（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责成李斯负责实施的。至于再后来，多元一体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基础。否则，就连我们这个共同的语言也早就辽化、金化、蒙化、满化抑或拉丁化了。后者正是“五四”时期一些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钱玄同等的主张，他们认为汉字像猪圈，四四方方，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连青年鲁迅也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的话，但他很快意识到了中国的问题并不能归咎于“汉字”，于是在《阿 Q 正传》的序言中，对自己曾经的言论进行了检讨：

“写他为阿 Quei, 略作阿 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 自己也很抱歉。”<sup>①</sup>他甚至鼓呼中文有三美: “意美以感心, 一也; 音美以感耳, 二也; 形美以感目, 三也。”<sup>②</sup>

综上所述, 中华文明之所以是几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是因为中文没有断裂, 没有被他化。因此, 她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领土完整。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成功实行的简体字和拼音改革, 为扫盲运动和中文普及乃至现代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此外, 在几乎所有外语中, 中文和中国人往往是同一个词。如今, 世界进入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大数据和大模型建设及其价值加工成为当务之急, 加速中文立法刻不容缓。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我辈肩上。

再说文学, 倘使将语言比作体, 那么文学就是魂。二者须臾不可分离, 并铸就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基本审美自觉、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譬如, 当我们有了《诗经》等古老的诗歌和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时, 我们的语言和文学就血肉难分、浑然一体了。此外, 文学作为发展的“加法”, 不同于其他学科, 甚至不同于她的近亲如史学和哲学。后两者一个追求历史真实, 一个追寻终极真理, 因此, 二者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否定或自我否定。举个例子, 一个世纪前, 无论是蔡元培等中国学人还是西方学界(当然主要是西方学界)都还相信中国文化西来说。譬如黑格尔(G. W. F. Hegel)在断言中国没有原生历史(《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的同时, 还在其《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中否认中国存在哲学体系。然而, 讽刺的是, 当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将黑格尔拥抱的唯心主义哲学雄辩扬弃的时候, 哲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不仅有悖于唯心主义主导的西方古典哲学体系, 而且以建立在存在和实践基础上的丰富理论包容、发展了我国传统哲学, 并化合、催生了以实事求是为内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而且, 西方学界关于中华文化西来说被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殷墟文化等考古发现打破之后, 中国的“史学转向”不可阻挡。其中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于1921年被发现, 殷墟文化

于1928年开始发掘(尽管零散的甲骨碎片是19世纪末, 具体说来是1899年被有心人王懿荣在药店抓药时发现并开始采集的), 继之而来的是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 等等。与此同时, 山顶洞人、蓝田人、元谋人等也于20世纪30至60年代被先后发现。因此, 说中国文化西来或没有哲学体系完全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因为希腊文化受两河流域, 尤其是古埃及和古印度的影响, 他们便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文化也应该是从西域传入的。

回到文学如何是发展的加法这一命题, 则必须有所说明: 第一, 文学经典往往既是历史的, 也是现实的; 第二, 文学经典往往既是民族的, 也是世界的。但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个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命题是鲁迅在答陈烟桥先生的信札中提出的, 它是有前提的。最简单的例证便是《红楼梦》至今没有进入西方人炮制的所谓世界经典谱系, 连夏志清、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这样的汉学家都对它颇有微词。另一个问题是并非所有文学作品都可以进入“加法”, 大多数只不过成为不断累积的庞大分母而已。因此, 我强调的是文学经典。用著名心理学家阿瑞提(S. Arieti)的话说, 如果没有哥伦布, 总会有人发现美洲; 如果没有伽利略, 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sup>③</sup>但奇怪的是, 如果没有艺术家, 又会有谁创作出那些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呢? 同理, 如果没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 倘使把这个问题换作如果没有曹雪芹, 又会有谁来创作《红楼梦》呢? 较之于莎士比亚的丹麦王子传奇, 这些南北、满汉文化交融, 宫廷、市井生活并举的红楼梦中人形象, 除了曹雪芹塑造, 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可以企及。况且, 文学作品一旦游离那个特定的时代、那个特定的作家, 终究是不可再造的。这不能不说文学经典是有偶然性的。与此同时, 大处着眼, 童年的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5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第354-3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③ [美]S·阿瑞提:《创造的秘密》,钱岗南译,第38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或格律诗)、成年的小说(或传记)又显然是文学发展的一种规律。这是由马克思关于希腊神话传说是人类童年创造的论断推演的,此历史唯物主义所自也。换言之,有关体裁的衍生契合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特定发展水平。因此,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就像基因图谱中的两根主轴,可以衍生出无限的差异性与可能性。

再就是,外国语言文学的引进一方面是交流、理解或借鉴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内外兼修的需要。外国语言文学的一些经典进入我国也不过是百余年历史,从“百日维新”到“五四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前三十年和最近四十余年,基本上服从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譬如“百日维新”期间或之后梁启超关于“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判断,或者王国维关于《红楼梦》的论述假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悲剧理论,结束了明珠暗投的历史并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如是,在 AI 时代,在跨学科联袂、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前提的守正永远不可阙如。这也是“百日维新”和“五四运动”以来的优良传统。不然,我们会陷入自话自说的可怕境地。

与此同时,当我们有了外国文学和当代文学时,决然不会放弃或者轻视古典文学。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一路下来,古典文学在今天同样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依然能够激发我们的共鸣和共情。尤其是当我们想起或默诵那些充满家国情怀的作品,一定会血脉偾张、激情澎湃。当然,不仅仅是家国情怀,用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话说,如果非要让他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和莎士比亚之间做出选择,他一定选莎士比亚。而我们从事外国语言文学教育与研究,一是出于了解和交流的需要,二是内外兼修的需要。后者包含着一个重要或主要向度,即为了发展和繁荣母体文学。没有“百日维新”“五四运动”,就没有德先生、赛先生和马克思主义的引进;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前三十年的政权巩固和后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形成。

这里就不能不说说特定意义上的情感在语

言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了。情感自古老的哲学(美学)到文艺学,再到相对新兴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都无法简单界定。正因为如此,它也许是人类抗衡 AI 的重要法宝,几乎没有之一。情感不仅是文艺审美的重要内容,而且还因其不确定性拒绝所有格式化和程序化操作。它既是动物本能,也是社会规约的最高级生命体验。没有情感,人类便只能是有知识、会思想的机器。当然,情感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甚至丑恶的。它还有性别差异,可以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激情,也可以是恒久的、伴随一生的喜悦或感动,梦魇或伤悲。作为本能,情感是生命表征,受制于人的内因与外因、个性和情绪;作为社会规约的反映,它又是认知的心理性和感官性的复杂内化或奇妙外化。前者可以瞬息万变、变幻莫测,一个外向开朗或内向忧郁的非排中律犹如无垠的宇宙,其程度之毫差让一切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在生活中纷繁呈现,在文学中精彩聚焦(甚至无限放大);后者可以是一切伦理道德、人文思想、技术理性和社会关系的主客观反映,甚至是集体意识和无意识表征。是故,灵与肉、内与外、形上与形下如量子纠缠,难分难解。

因此,语言文学的秘诀,或可称之为文心者,往往首推情感。至于情感之美,则是笼统的说法,其中充斥着审美和审丑的交集与纠葛。有道是情感乃人类最高级生命体验。情感犹如太阳,让审美、意义、价值、伦理、修辞等一众行星远近环绕。一切是非好恶、喜怒哀乐皆在经意和不经意间服务于她,甚至连理智也常常谦让于她。一个怦然心动或血脉偾张,抑或毛发森竖、不寒而栗,喜极而泣、潸然泪下,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常常是“有感而发”。优秀的文学作品大抵都是有感而发,反之不是无病呻吟、为赋新诗强作愁,便是玩弄机巧、强按牛头饮水。那么文学批评呢?是否也应该有感而发,带着脉动、体温和风骨?

王国维曾说,“感情生活之发展之最高者,美之理想也”<sup>①</sup>。他从个人修养、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层面强调审美的重要性。然而,怪谲

<sup>①</sup> 王国维著,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 2 册,第 69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的是现代西方文论鲜有关注读者情感诉求的,即或有也已然被林林总总“高大上”的主义和后主义所掩埋。一个执着于文学“教育”的文本细读或一些致力于叙事形式的砖砖瓦瓦抹去了情感作为审美核心的亘古逻辑。当然,我不是说文本细读和叙事形式不重要,但它们必须服从文心文情的需要。诚所谓“文无心不美,诗无情不丽”,陆机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云:“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sup>①</sup>钟嵘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sup>②</sup>

惊天地、泣鬼神,但前提是诗文有情有感,否则便不能如阳光般晖丽万物,烛照三才——天、地、人。为此,单有情感还不够,还需要修辞。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修辞是一切文体和情感表达的关键。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用大量篇幅强调修辞的重要性,如《章句》谓“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理资配主,辞忌失朋。环情革调,宛转相腾。离合同异,以尽厥能。”又如《夸饰》赞“夸饰在用,文岂循检。言必鹏运,气靡鸿渐。倒海探珠,倾昆取琰。旷而不溢,奢而无玷。”复如《情采》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再如《丽辞》言“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sup>③</sup>虽然现代主义兴起以降,轻忽修辞渐成气候,以至于清汤寡水、不饰辞藻,甚至将连篇脏话搬进文学,却美其名曰“审美生活化”或“生活审美化”。

如今,语言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在科技理性日趋发达的今天举步维艰,以至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悠久的语言史、文学史和无数语言文学珍宝的国度不得不面对无用论的冲击。诚然,无用论不是今天第一次出现。文学本就是“无用之用”,所谓“方为大用”是指人在衣

食住行基本满足之后的精神需要,其中情感诉求占首要位置。后者既可以是狭义的审美愉悦和心灵滋润,也可以延展至广义的精神享受和文化修养。总之,语言文学是一个作为国家精神主权的大话题,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其有用无用的问题。

最后,回到外国语言文学的问题与前景。有了前面的铺垫,再来讨论外国语言文学就比较容易了。首先是问题。在我看来,迄今为止我们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脱离了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优良传统,即从“体”“用”思想演化而来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精神;二是与母体语言文学渐行渐远。这两个问题紧密关联,它们不仅影响了外国语言文学作为学科在国人心中曾经拥有的某种尊崇地位,也同时影响了我们这个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这里可以斗胆举几个例子:一是西方现代派的某些“经典”,或者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作品是否值得我们效仿;二是我们的刊物和著述如何陷入了自话自说的怪圈。这两个问题同样相辅相成,其导致的最大问题是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以界定。众所周知,文学是由文和学组成的偏正词语。她的门槛很低,因为我们从小就会接触文学,譬如听人讲故事就是接触文学的开始。但文学之水又深不可测,广不可及。人类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经典,同时正在并将会创造越来越多的作品。因此,现在要回答什么是文学,就好比试图深潜到马里亚纳海沟底部或者探测整个太平洋。怎么会这样呢?

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但当时的“文学”是人文与学术的集合,泛指经史子集,文史哲尚未分家。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文化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两汉时期开始用文章家指称人文学家。魏晋时期,文章被抬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是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

①③ [梁]刘勰撰,王志彬译:《文心雕龙》,第184、200、212、182、20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

② [梁]钟嵘著,向长清注:《诗品注释》,第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典论·论文》)。也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文学体裁逐渐成熟,开始有了审美自觉,五言律、七言律成型,小说大量产生……于是,从《诗经》到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下来,几千年过去了。但文学这个名词作为特殊的指称却要等到近现代学科的分野才开始确立。鲁迅认为这个词是从日本引进的,而日本也是在明治维新时期受到西方影响才启用这个概念的,其已经不同于《论语》的“文学”了。简而言之,受西方近现代学术影响,文学才有了与史学、哲学等姐妹学科的分界。即便如此,我们都知道“文学是人学”,或者“文学是形象思维”,又或者“文学是语言艺术”,又或者“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等等。虽然这些定义都比较抽象,但它们大抵给出了文学的一些本质特性。与此同时,从“轴心时代”起,我们就有了老庄的“无用之用”说和孔孟的“文以载道”说、“诗以言志”说,等等。在西方,则是柏拉图(Plato)对诗人的怀疑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悲剧的肯定(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摹仿”论),以及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的“寓教于乐”说。而“无用之用”典出《庄子·逍遥游》,是庄子和惠子关于“有用”和“无用”的一次谈话,后被用来指涉文学,谓“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文学一不能吃,二不能穿,三不能住,唯一的好处是茶余饭后的会心阅读与聊可平衡道器的审美鉴赏。喜怒哀乐,无所不包;浓墨轻彩,丰俭由己。该出手时学堂吉诃德,该犹疑时学哈姆雷特。诚然,说到平衡道器,又不免有一个用字,或者拿悲剧医治哀伤、用喜剧自嘲嘲人;又或者陶熔诱掖、熏浸刺提,却并非必须立竿见影。至于能否兴观群怨,则更要

看才华、积累和(话语)力量。再说得功利一点,文学还是民族文字的土壤和硕果,而文字无疑是民族文化的最大传统。其对人类的贡献,大是脱蒙,小谓脱盲。而民族的所有经典,譬如我们的经史子集,皆应中文而在,中文又皆应文学而丰盈美丽。

这些都是文学的 ABC,但它们正在被人遗忘、遭人不屑,原因主要归咎于 20 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颠覆和解构。后者使文学走进了形而上学思辨的死胡同。于是,也便有了文学的“回归”(回归现实主义、回归情节或情感、回归审美,但归根结底是回归常识)。

至于前景,我想已经不用多费口舌了。因为语言文学作为各民族国家精神文化主权的特殊性质,因为她们蕴含或浸淫着人类最基本也最丰富的情感元素,这些都不是 AI 大模型可以简单取代的。从国家层面的家国情怀,到个人心性的喜怒哀乐,都不是 AI 可以简单呈现的。因为语言文学在时代长河、社会变迁和个人遭际中瞬息万变、变幻莫测的特性很难与 AI 大模型达成等值效应,而这正是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存在理由和发展空间。所有试图贬低或轻视人文学的舆论和做法都将很快被反噬并受到制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原理研究”(22&ZD28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文艺学。